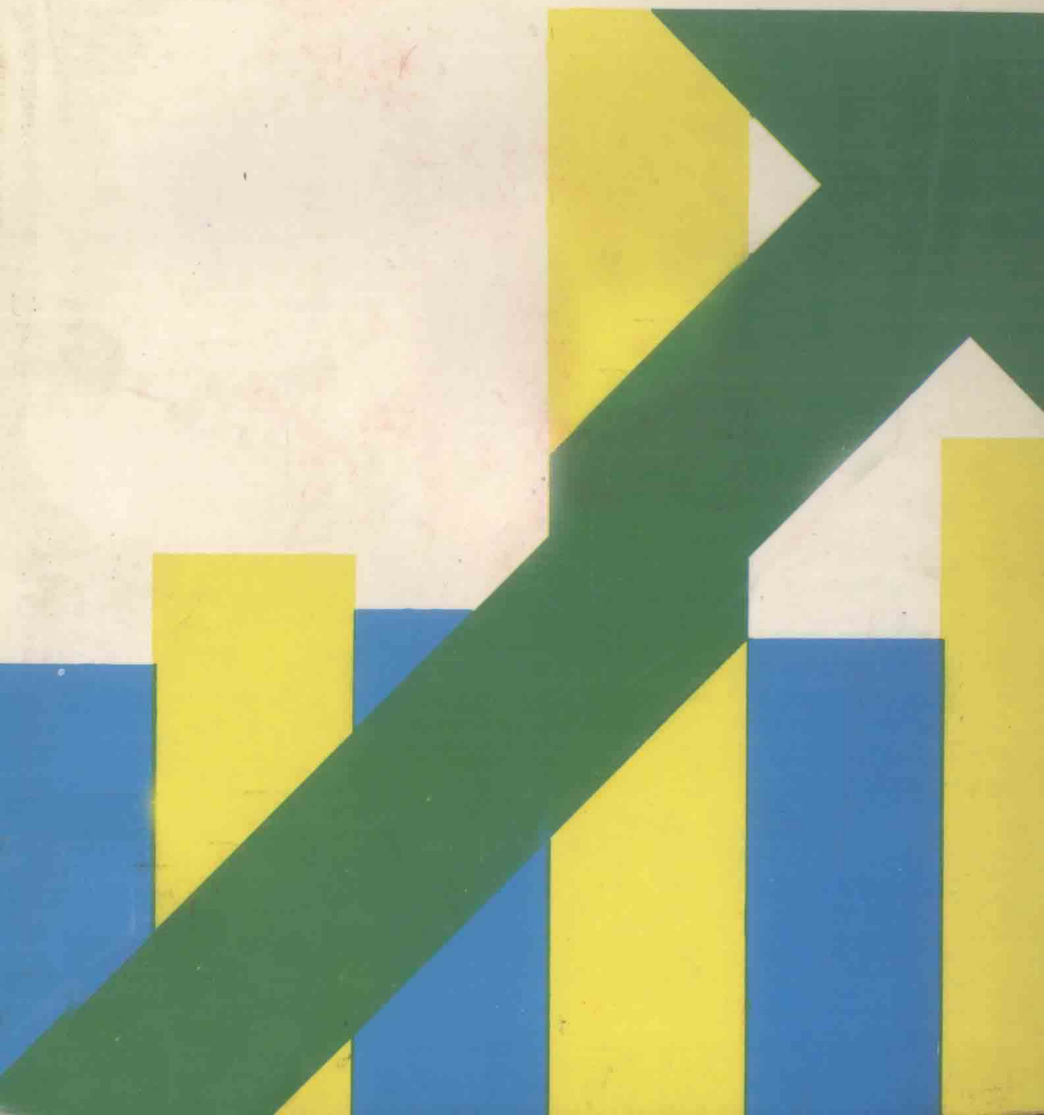


李弘祺等著

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



李弘祺等著

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一日初版

史 學 方 法 論 集

精裝 二百五十元
每冊定價新台幣
平裝 二百元

著 作 者 李 弘 祺 等

發 行 者 食 貨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住 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五十七號六樓之十一

電 話：七五一〇〇〇二

登 記 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局版業字第台二〇〇號

印 刷 者 瑞 明 彩 色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住 址：台北市康定路一七三巷三三號

電 話：三八一八九二八・三七一九六一六

序

李弘琪

「思與言」從創刊到今年已經有十五年了，這一次我們決定出刊「史學與史學方法」，把這十五年中「思與言」所曾刊佈有關史學的文章擇要收集在一起。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們當然不是認為這些文章已足夠代表這方面的現狀，更不是認為這些文章能「開一代之風尚」，指示今後史學應該發展的方向。主要的是我們認為「思與言」在過去十五年當中曾經在提倡史學的發展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現在把這些文字收集在一起，正好紀念創業諸人的辛勤努力與貢獻，並向所有的史學工作者致敬。如果書中的許多意見，在今日看來已經十分熟悉，甚至於陳舊，那麼讀者正由此可以看到「思與言」所努力的結果。

我想「思與言」雜誌在過去十五年來的最主要貢獻是在於鼓吹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相關性。本集中所收錄的「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H. S. Hughes 原著，雷成慧譯），「社會科學與歷史學討論會記錄」，以及「人類學與歷史學」（謝劍著）三文可以說是直接針對這個題目的。十五年來，歷史家們可以說已普遍地接受史學家應該援引社會科學的理論這個說法。我不能把這個功勞歸給「思與言」，因為中國史學家認識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可以遠溯到二、三十年代，比西方史學家一點都不慢。考古學，人類學及社會學都對中國史學界提供了寶貴的服務，而三十年代的「食貨」雜誌也作了非常有用的橋樑。

近二十年來，「社會流動」的理論及統計學方法的應用，成了一

般歷史系學生耳濡目染的觀念。這是一件很值得我們興奮的地方。本書所選錄上舉三篇文章都是從理論的層面來探討歷史與社會科學的關係的，但「思與言」也曾刊行過陳義彥所寫的有關北宋社會流動的文字。可以說「思與言」所作的努力正好是繼承了中國史學界過去的業績，把過去陶希聖，楊聯陞，全漢昇等人的貢獻從理論的層面上加以拓展。近年來，從統計學上（如孫國棟所研究的唐宋間的變革，以及唐代的官僚），經濟學上（如全漢昇有關米價的問題，中美非貿易關係的問題所作的研究），社會流動的理論上（如許倬雲的先秦社會史論），人類學的涵化（acculturation）學說上（如陶晉生有關女真漢化的研究），甚至於從心理分析的方法（如杜維明對於王陽明認同危機的解釋），或從官僚結構與知識份子的職份之依違關係上（如余英時對有關中國知識份子的起源的解釋），我們都看到了社會科學的實用性。任何一位治史的人都不會輕易否認社會科學的價值。

對於史學最有影響的近代社會科學家有涂爾幹（E. Durkheim），弗洛伊德（Freud），孔德（A. Comte），馬克思（Marx），韋柏（Max Weber）以及埃森西塔（S. N. Eisenstadt）等人。本書收入了「韋柏對於人類行為與歷史的解釋」（黃俊傑著）一文，而「近代西洋史學的發展」（李弘祺著）則論及孔德的歷史理論。又未收入的「埃森西塔對帝國的政治系統之研究及其對中國歷史之解釋」（黃俊傑，刊第14卷2期）一文則從具體的事例來論究社會理論對歷史可作的貢獻。我們希望讀者能從這些作品得到靈感及指示。

Hughes 認為歷史研究根本避免不了使用社會科學，並把布洛克（Marc Bloch）的史學方法作為一個典型，這是很對的。比布洛克略早的比蘭（參看許倬雲：一位廿世紀的史學家——比蘭），他的為學方法與布洛克極為相似，可以說是合於 H. S. Hughes 所說的使用構想的論斷（Schematization）方法的史學家。從歷史研究的立場言之，布洛克和比蘭的治學方法是在於研究社會的歷史，而不

僅止於使用社會科學的方法治史了。我想這裏頭有一個重大的區別，雖然這個區別可能是十分的微細。研究一社會的發展史使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的內在發展的脈絡，一些即使沒有外來的政治變遷也必然要產生的變化。這一個治史的傾向在比蘭所作的「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一書中流露無遺。在傳統的歷史中，蠻族的入侵形成中古早期最紛亂的時期，因此是造成羅馬帝國亡國的動因。古代世界到了西元四七六年便告結束。但是在比蘭的觀點裏，地中海世界局面在這一段時間卻是完整的，其中結構上的演化與外在的政治動亂並沒有正面的關係。所謂社會史的研究就是這個意思。

另一方面，由布洛克及其好友 Lucien Febvre 所開創的「社會及經濟史學報」(*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學派是現在的歐美史學界極具影響力的學派。很可惜，「思與言」在這一方面不能提供更詳盡的消息。但是國內介紹這個學派的文章已經開始出現了。學報學派最大的貢獻就如上所述：熟悉掌握社會科學的理論，從而探討一社會的經濟階級或社會結構的變遷過程。他們對於農業社會的演變，研究成果斐然，現在中國史家有從事農業史的研究者（如許倬雲、趙雅書、陳良佐對中國農業史的研究），這不能不說是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學報學派或譯作年鑑學派）。

從所謂的社會史的方法，我們可以進一步談社會的外在因素對思想的影響。社會史的方法論多少受到法國社會學傳統中認為社會是一個自己有生命的有機體這個觀念的影響，所以他們強調社會發展的內在脈絡。但我們可以問：社會結構或生命的演化是否也影響了人對生命、宇宙或自然的觀察和想法呢？我想所有學歷史的人都會認為是有影響的。我在「近代西洋史學的發展」一文中一再強調近代西洋史學所發展出來「整體史」的觀念。所謂「整體史」的觀念，它的特色不外是認為歷史中所有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單元的發展都是互相

牽扯，相互爲用的，因此歷史家不應該單獨分析其中的因素，作孤立的處理。將此理論推到極端，也會形成偏頗的說法，但是我們不可以忽視這個「整體史」的觀念。本書中選錄的「試論思想史的歷史研究」（李弘祺著）一文便是假定思想及其時代背景有密切的關係的一篇文章。思想史近年來受到許多非議，主要是因爲許多歷史學家認爲思想只不過是外在物質條件的反映，因此沒有特別的意義。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危機，也是許多治思想史的人所共同關心的一個課題。但是中國歷史家仍以治思想史者在社會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如錢賓四、余英時及林毓生等是。而後兩位先生又能徵引社會學理論，這是令人興奮的地方。

研究社會史的歷史家可以對史學方法提供許多有價值的貢獻。但另一方面，過分強調社會的內在生命及發展便會造成對歷史（特別是政治史）的忽視。試舉一例言之，假如我們認爲某一個農村的變化是由於其人口的增加，財富分配的改變等因素所形成，那麼這便是認爲中央政府的權威並未達到這一個農村，或至少是沒有產生真正的影響。這是提倡社會史的人所常遇的困窘。更進一步說，社會史的方法論常常適於研究相當穩定，不常改變的社會，而不適於研究劇變的社會。理由很簡單，工業化以後的社會，政府及社會組織趨向於合理化，官僚制度興起，並規劃社會變化的途徑，於是舊有制度解體，而其解體及轉化的過程卻必須歸功於有計劃的改革，人口及財富的分配等因素不再是形成變化的基本動因。許多學報史家長於中古農業社會的研究，拙於工業社會的探討，其理由恐怕就在此。

「變遷」是歷史家所共同關心的，學報派史家多關心全盤性的緩慢變遷，而十九世紀受德國歷史主義學派影響的史家則特別關心政治及外交等因素所形成的變遷。現在西方史學家對於歷史主義史觀毀多於譽，但是過去一百多年來，德國史學家所提倡的求真精神，考古材

料的應用，以及政治史的撰寫卻影響及於全世界，在今天，仍有深刻的影響。廿世紀初年中國史學界的普遍重視考古材料，以及傅斯年創立史語所時所說的「歷史學不外是史料學」等等都可以說是這一個風氣的影響。前數年去世的姚從吾教授更經常採用班海穆（Ernst Berheim）的史學方法教本，讚揚尼布耳（B. Niebuhr）及蘭克的史學，可見他欽佩德國史學的地方。

但是德國史學的背面卻有理論上的架構，這就是歷史主義。我在「近代西洋史學的發展」一文中曾對歷史主義作簡單的介紹，並把近人對歷史主義的批評作了一個報告。

不管歷史主義有什麼缺點，它所重視的史料及所強調國家在歷史中的重要性這兩點卻與傳統中國史學十分接近。梁啟超曾嘲笑中國廿四史是相斲書，這話說得過分強烈，但卻反映出中國歷史作品中的濃厚政治史色彩。另一方面，德國史學的史料學特點又與乾嘉以來的考證風氣十分近似。由此言之，學報派史學的特質可能正也是傳統中國史學所缺乏的。引用社會史的觀念和方法可能對中國史家有相當的益處。例如過去百多年來的中國史如果從政治史的立場言之，那麼毫無疑問的，它是一個「列強侵華」的歷史；但是如果從社會史的立場來看，那麼市場結構的改變，新作物的普及，人口的迅速增加便成了研究社會變化的主題，推此以溯古今，那麼我們也可以考慮諸如朝代的更遞是否一定對小農村產生影響這一類的問題。

歷史主義的史家除了重視變遷的問題外，他們更強調「獨特性」。關於這一點，我在論近代西方史學的文章中也有簡短的敘述，而李恩涵所譯柏靈（Isaiah Berlin）的「科學的歷史」也指出這一個歷史學的特質，並說許多人以為「獨特性」和「通則」可以用辯證的方法或現象學的方式統一起來。伯林自己對這個看法並不同意。他主張我們應該繼續循維科（G. Vico），赫德（J. G. Herder）一系列

以降，迄於韋伯的說法，繼續認為歷史學的治學方法及目的與自然科學不同。

伯林這個見解基本上與歷史主義的中心信條相近。他雖未特別強調「獨特性」，而提倡所謂的「體驗」或「瞭解」（*Verstehen*），但是他仍不免這樣說：「當然所有的事件都是獨特的，自然科學家所處理的比其他人所處理的事件都一樣地獨特；但是科學家對獨特性沒有興趣。」

不管是強調「獨特性」或強調「體驗」、「瞭解」，這裏頭都隱含了一個自然科學所可以規避的困窘——主觀。許多談歷史哲學的人不肯正面處理這個問題；有的人（如 E. H. Carr）認為自然科學也只是無止無休的修改假設，接近真理的學問，因此沒有完全的客觀。但有的人（如 Peter Gay）則認為生活的體驗與歷史的事實相觸後所流露出來的忠實報告雖然因人而不同，但因為人由體驗而統攝的歷史是忠實的，因此在那個忠實的報告中，我們便發現了真理（或客觀）和真理「如何」因人而異。

如果歷史寫作確實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報告相異，允許歷史家主觀體驗的介入，那麼雖然讀者可以由史家的生命方式來研判史家所陳述的歷史，並由此建立由自己的生活體驗所得到的真理，其結果歷史仍會因人而異其價值了。

讓我們姑且承認這樣的致知過程是科學而可靠的，我們卻仍必須承認歷史學因此兼具文學與藝術的特質。文學或藝術在表達作者的意念和信仰時當然是主觀的，但它們處理的素材卻經常要通過科學的程序。由此言之，歷史就與文學或藝術有其相通之處了。

既然史家的體驗和意念必然由歷史寫作流露出來，那麼我們豈不是等於認為史家不能避免道德判斷的困窘。關於這一個擾人的問題，本書的「研究歷史應否運用道德的裁判」（王樹槐著）一文從很實際

的立場，分三點去研討，並認為歷史家應該避免應用道德裁判。王先生的文字淺顯明晰，把一個基本的史學問題作了明確的交代。我相信所有的讀者都可以接受他的結論。

但是如果把道德觀念當作是一個史家的「體驗」的一部份，是他拿來處理歷史事實的基本信念，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價值判斷的不可避免了。「思與言」第三卷第一期的社論「史學的相對觀點」這樣說：「相對的觀點絕不可與漫無標準的任意作風混為一談」。這是說相對並不等於不負責任。負責任的「瞭解」正就是史學可以成為一門有社會及文化意義的學問的根本原因。

「思與言」在過去十五年的文字中比較少有從這個角度去探索史學的文字。我不能否認上面所舉的「瞭解」和歷史的社會及文化意義沒有太大的關連。史著是史家通過他自己的體驗去和材料相接的結果，它基本上是個人生命的昇華。但如果我們又進一步地說每一個個人的體驗又是他所生存的文化、物質、社會、政治等條件的產物，那麼歷史就可說是一個社會或文明可用來觀看自己的鏡子。

讀者或許會以為我故意把近代西洋史學的最重要觀念加以彎曲，好硬套入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其實不然，以鏡子喻史著之效用，在西方十六、七世紀也十分普遍，它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深意。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今天的史學家要逃避對這一個問題的思考。

依我的看法，這主要是因為我們認為如果沒有確實的證據和可靠的答案，那麼歷史便不能活用。另外也是因為許多人反對神命論(Providence)，竟因此懷疑一切形上的歷史學研究。我想這兩種態度都是可以瞭解的，並且歷史家還應該繼續在其學習及寫作歷史的過程中，慎用自己的體驗，反省自己的瞭解。但另一方面，如果歷史作品不能彰顯一個歷史家對自己的文化、社會的切身關心，把自己「憂心如

焚」的體驗形成對歷史問題的迫切「瞭解」，那麼他根本沒有擔負起他的責任。

歷史家的責任如此，我們竟好像不能不諒解許多受到國家主義浪潮所支配的史家。究竟一個人應該如何站在人性的立場來表達出他對人類史的關心呢？我認爲這是現代歷史家最大的課題。十九世紀的德國史學家認爲國家是歷史研究的最終極可靠的單位，因此他們的作品處處充滿了國家主義的色彩，無形中替德國的軍國主義政府作了無謂的服務，這是十分不幸的。因此當我們說歷史學有它的社會意義與責任時，我們必須十分謹慎，時刻防範外在的勢力，避免讓一己的「體驗」作爲暴政的工具。

怎樣作到這一點呢？很可惜，廿世紀的史家們對這樣的問題一樣的不甚了了。因爲這個問題已經從歷史知識論的範圍轉入了形上學的範圍了。廿世紀的歷史家企圖回答這一類問題的當然以史賓格勒（O. Spengler）和湯恩比爲最有名，但是他們的嚐試卻是失敗的。本書中收有「湯恩比的歷史研究與歷史」（駱雪倫著）一文。作者指出湯恩比的歷史研究到了最後仍必須在宗教裏尋求歸宿，使得歷史哲學又淪落於「神命論」的窠臼，是等於背叛了歷史家求真的基本精神。

對於湯恩比，我們還可以列舉許多不同的批評。這些批評不外指出他的歷史作品缺乏實際的史料基礎。但是我想這樣的批評不僅比不上上述駱雪倫的評斷，也比不上站在與湯恩比相同立場所作的批評。爲什麼這樣說呢？因爲我們不能等所有可靠的材料和研究都齊備了以後才進行綜合的工作。因此指出湯恩比所犯的事實上的錯誤，而不肯提出方法論上批評，對於湯恩比所關心的問題並無助益。

湯恩比關心的是歐西文明的去處問題。而他的方法論卻和世界史的寫作有深刻的關係。我們不能否認在科學及工技如此發達的二十世紀，歐西文明的去處問題已爲全人類文明去處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

承認他的關心是合理的。但是就世界史的方法論上言之，我想他有許多值得或必須批評的地方。

本書收有杜維運教授所寫的「比較歷史與世界史」。杜文有兩個主旨：一是說世界大通以前也可以有世界史，一是認為比較歷史才能促進世界大同。請先就第二點言之。杜教授首先引用比蘭的話：「比較歷史與世界史的觀點是沒有二致的」，然後舉例說明各文明對人類歷史所作的種種不同貢獻。這等於是認為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發展途徑，而對人類歷史作出各樣不同質，不同量的貢獻。引申此說，我們可以說世界只有一個歷史，而各文明則在這一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作出不同的貢獻。準此，只有當一個文明拒絕承認他在世界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時，他才會死亡。如果一個文明在扮演完他在世界史中的角色時，能容許另一個文明登台，並接納新文明的角色，那麼他自己便繼續在世界史中存在，以等待扮演新的角色。

由此看來，湯恩比的世界史方法的缺點就是因為他缺乏「世界只有一個歷史」這個概念，以致於當歐西文明走到枯竭的時候，他竟然希望通過宗教來解決其歷史命運。這是從歐西文化本位看歷史所必然引致的危機。晚年的湯恩比似乎對宗教的觀點有新的醒悟，把東方文明對人類歷史的貢獻當作是「神之所命」，而解決了歐西文明必須與東方文明合流的神學基礎，這個奇怪的論點值得我們探討。但不管如何，如果治世界史而缺乏比較歷史的視野，那麼世界史就變成了「大文明沙文主義」的產物了。

由此談到杜教授的第一個主旨：世界大通以前也可以有世界史。這是一個不用爭辯的事實。但是許多人卻還是以為把許多地區的歷史抄在一起便是世界史。杜教授把李約瑟和受李約瑟影響的丹斯（E. H. Dance）提出來作為例子，我想這是很重要的。大通以前的世界史應該從比較不同文明的成就來進行。這是李約瑟的鉅著的中心之所在。

李約瑟的另一個重要的方法是找尋東西方科學思想及技術傳播的途徑及過程。他的研究使我們知道古代世界諸文化之間的接觸十分的頻繁，遠超過我們所想像。基於相同的考慮，有名的漢學家顧理雅（H. G. Creel）也曾指出西方的公僕（civil service）制度是由中國傳過去的。如果李約瑟和顧理雅的結論證明是正確的話，那麼推廣他們的業績，或許我們真能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史的系統：即世界自有史以來便經常有各樣的物質或思想的接觸與來往，各文明之間經常相互仰賴，相互借用彼此的發明。許多自以為是本土的發明到頭來可能被證明是源自其他的文明。在這樣的世界史觀念之下，各文明就因此愈形謙卑，認為接受其他文明的長處是一件必須而光榮的行爲，這是世界史對世界大同所能作的最有意義的貢獻。

具備了這樣的觀念之後，回來看李約瑟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一書反覺得其中心問題問得有點不必要。李約瑟希望找尋爲什麼古代中國那麼發達的科學技術不能造成科學革命。我想李約瑟當然有權問這個問題，但從世界史的觀點看來，世界上總只會有一個文化能造成世界史中新楷模（paradigm）的突破，即然中國文化創造力的中心是在於儒家理想的建構，那麼科學知識及技術的發展沒有突破，讓後起專心於這一個事業的西方文明去開拓現代科學似乎沒有值得我們奇怪的地方。換言之，學習中國文明而不能肯定中國文化的中心在於儒學的理想，以致於認為中國文明中有阻礙科學革命的因素，這就是不能肯定中國文明在世界史中的地位。

不過，就如我在上面所說的，「世界史」的觀念是建立在肯定各文明對世界歷史的正面貢獻，因此背負一文明的傳統包袱，以致於不能迅速納入世界史的發展途徑，那麼這一個文明就會產生危機。關於這一點，言之極其容易，而能不偏不倚地信賴它卻極爲困難。當湯恩比思索西方文明的危機時，他竟然要回去原始基督教去尋求其解救的

藥方，這不就是一個最有趣的代表嗎？

「思與言」在過去十五年的作品裏還有一個特色：我們總一直不以吸取近代西方學術爲恥。也許有人會問，到底要吸收什麼呢？到底世界史的潮流在那裏呢？我必須坦白承認我並不知道。但正如黑格爾一樣，我認爲世界史的發展應該是合理的；諸文明的花朵，紋彩繽紛，形狀各異，但合而觀之，卻優美如一幅精心安排的圖景，這是世界史微妙的地方。

本書中收有三篇專論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文學。我們收入這些文章，就正是因爲「思與言」一直有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信念。「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趨勢與必要參考書目」（李恩涵著）把當時的重要書名及研究的趨勢作了一個十分詳細的介紹，雖然這篇文章是十年前的舊作，仍然十分新鮮，是所有治中國近代史的同學所不可忽視的。「近十年來西方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趨勢與重要著作」（楊意龍著）則是補上次之作，把最近西方的著作作一個簡單的介紹。但西方人（特別是英美學者）治中國史除了有他們不可避免的偏見外，畢竟有許多我們所缺乏的工具、設備或訓練。依我的看法，他們最主要的長處就是勇於推陳出新，不斷地要克服前人的缺漏。「漫談近年來美國學界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陳啓雲著）便講到十餘年前在美國學術圈中的一場頗有建設性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如何善用社會科學的問題就是在美國或西方也是一個很新的問題。而十餘年後的今天，一方面已有學者（如William Skinner 或 Thomas Metzger）希望用治中國史的結論來修正傳統西方社會科學的假設，而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如牟復禮 Frederick W. Mote）本中國史的立場批評一些只會用社會科學的術語而妄談中國文化的人。把西方的中國史學術拿來和我在這篇序中所說的諸點略作比較，我們可以說「思與言」曾經盡力把西方的長處推介紹給中國的學者，其貢獻是很大的。

嚴格地說，史學原應一併重視史學方學，但本書講方法的只有「發展學術必須自健全工具作起」（王爾敏著）一文。雖然只有一篇，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這是因為我深信史學方法除了基本的邏輯思考外，其他是史學史。所謂內證、外證等觀念不外是把嚴謹的思想方法應用到歷史研究上面去。至於如何解釋、如何應用輔助科學等問題則常常因時代而異，殷勤的學者必須時刻反省自己的方法，好使自己處理問題時能用上最新，最好的方法。由是言之，史學方法不外是史學史。王先生的文字若從這個觀點言之，便可以瞭解其意義及有限性。基本上，這個強調工具的觀念是對的，但歷史系的學生必須知道有那些工具可以使用。這就超出了史學方法的範圍而與歷史本科的發展息息相關了。王先生的文章因此必須放在十餘年國內歷史學的發展角度來看，這樣我們便可以知道王先生所提議的是那一種史學方法。近來好的工具書已陸續刊行或重印，我們固不敢說「思與言」有什麼貢獻，但至少「思與言」也曾注意這一個問題。

「提供發展史學的意見」（張存武著）一文也是針對史學界而發言的。一方面我們希望張教授在十餘年前所說的各點已有了進步，而另一方面這篇文章仍有其價值，因為它所提的原則是必須經常加以重新估價與思考的。「廿年來我國的史學發展」（本社）雖是研討會的記錄，而其價值也與張文相同，正代表了李恩涵先生在會中所提「集體討論，互相批評」的精神。在過去廿年的發展當中，「思與言」曾經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緬懷這一段日子的史學發展，正是每一位學歷史的人得以充實自己的最佳途徑。

廿世紀的歷史哲學已從十九世紀的形上玄思解放出來，而走入知識論的領域。近二、三十年來，由名雜誌「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帶領的工作，已普遍為歷史學者所重視。不過這路學

風多談理論，而缺乏在史學著作上作踏實的功夫，因此專業史家亦頗有微詞。過去十五年來，「思與言」在這方面沒有什麼介紹，但這一派所謂的「分析史學」的理論已在史學討論上佔有一席之地，我因此特地從「食貨」月刊商借了「歷史解釋和通則的關係——韓培爾觀點之檢討」（黃進興著）一文收入本書，希望補充本書在這一方面的缺漏。韓培爾所說的史學致知過程引起學術界很多的研究與辯論，近代學歷史的人不可以不知道他的論點。

另外有一點不能不提的是中國史學的豐富傳統。我在這本書中不能收入專論中國史學的文章，這固然是因為過去十五年來「思與言」所刊載的此類文章絕少，也是因為從傳統史學過渡到具有世界史胸襟的史學需要有相當細膩的手腕和識見。我相信中國史學傳統中的「敘述」文體——特別見諸於筆記，劄記者，後來與考證的精神配合後發展出像王國維、羅振玉乃至於陳寅恪這些人的史學方法，這是一件重大的演變。另一方面史論的傳統過去未受史學家（如劉知幾、章學誠）所重視，其實這個傳統中有一部份後來發展成專考制度興衰的文字，超越了限於人事浮沉的道德性文章，遂可以替傳統史學鋪排一條橋樑以準備迎接新史學。從這兩點言之，正統中國的史學（特別是所謂的正史傳統）固然已經式微，但中國傳統中較被忽視的敘述文字和史論方法卻在中國史學蛻變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思與言」不能誇稱它在推動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再評價中起了什麼作用，也因此本書中缺乏這一類的文字。但歸根究底，「思與言」不斷地提倡大家研究現代史學理論，其目的不外是重新詮釋中國史學傳統，使它能去蕪存菁，日益向前。近年來論史學者頗能就中西史學之比較立場著眼，使中國史學的長處與它在世界史學中的地位得到落實的處理，這是很令我們感動興奮的地方。

最後，我必須向讀者道歉的是本書定名為「史學與史學方法」，

而不僅講「史學方法」者絕少，體例又極不一致，文章長短各異，譯名且不統一，有的有註，有的沒註，使我感到十分的遺憾。本來我應該從頭到尾徹底加以規律整齊，但這樣的工作十分冗長，且不一定能保留諸作者本文的精美，因此沒有去作，我希望讀者千萬諒解。

編輯過程中蒙張存武教授、黃俊傑先生多方聯絡，我必須在這裏深致謝意。所幸大家作事，目的都是爲了「思與言」這個雜誌，只要這本書能成功地代表了「思與言」社在過去十五年的努力，那麼我們就心滿意足了。因此，我們鄭重地把這本書呈獻給創辦「思與言」的諸位先驅。

李 弘 祺

民國六十七年三月於香港中文大學